

我不是「盲妹」： 近代華人女性盲人的生命故事*

邱 大 昕**

摘 要

西方傳教士於 19 世紀在中國設立的盲人學校，經常被視為當代中國特殊教育的開端。這些學校對盲人究竟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相關研究迄今極少從盲人學生本身角度來加以檢視。本文以相隔百年的兩位女性盲人為比較對

* 本文初稿曾於 2020 年 11 月 18 日，在中研院近史所舉辦之「跨界的性別史研究：理論與實踐」工作坊中發表，感謝當時與會者提供的許多寶貴建議。很感謝游鑑明教授的鼓勵讓本文在初稿發表兩年後重見天日，也很感激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本文的許多細膩的修改意見，讓本文得以更為完善。

收稿日期：2022 年 12 月 8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 年 2 月 20 日。

**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象，一位是 1836 年生的 Agnes Gützlaff，另一位是 1936 年生的程文輝。透過她們精采的生命故事來探討時代變遷中，盲人教育對不同社會階層的女性的可能影響，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對這議題的注意。

關鍵詞：盲人史、盲人教育、障礙史、障礙與性別、特殊教育

棄嬰被撿拾，挖掉眼睛成為在街上遊蕩的乞丐，靠著別人對他們的憐憫來賺錢。¹

衣不蔽體的飢餓盲丐，敲鑼、吹笛、嘶吼、歌唱，折磨著旁人可憐的耳朵，直到人們掏出錢來，讓他們走開去折磨其他人。²

〔盲人〕有的蹣跚而行，有的讓小孩牽著，或者排成一列由前頭盲人持杖帶領……發放白米時，會聚集多達六百個以上的盲人。³

這些是 19 世紀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大城市時，經常會出現的景象描述。傳統中國盲人多以算命、走唱、乞討維生，可能白天算命、晚上走唱，或者一邊走唱、一邊行乞。如果天氣不適合戶外行動，或者生計發生困難，又沒有家人照顧

1 Anonymus,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London), XI (1860), p. 207.

2 D. S. M., "The Blind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20:5 (1889), p. 218.

3 C. F. Gordon-Cumming, *The Inventor of the Numeral-Type for China By the Use of Which Illiterate Chinese Both Blind and Sighted Can Very Quickly Be Taught to Read and Write Fluently* (London: Downey, 1899), p. 10.

時，盲人才會去尋求官方或私人的救濟或收容。等到天氣好轉，他們就會離開收容所重新回到街頭討生活。當時粵語地區還流行著一種盲女彈琴唱曲的娛樂生活，許多官僚、富商、豪紳喜歡找「瞽姬」或俗稱的「盲妹」來彈唱，加上一股「堂口」認為盲妹較易管理，因此在廣東形成風氣。⁴

每到黃昏的廣州，無論在什麼地方，耳邊一定可以聽到二弦……是盲妹開始上街了……她們手拉著二弦……腰間挾著一根三四尺的小竹竿，前面有一位老太婆拖著引路，一批一批，不斷地在街上巡迴。⁵

每個盲女都用手搭在前面的同伴肩上，魚貫而行。她們衣著豔麗……臉蛋粉飾塗抹著，頭髮也經過精心裝束……這些盲女走在街頭，時而演奏樂器，時而以淫蕩的言辭大聲招攬路人到她們那兒去玩。⁶

好的盲妹價值，幾與出色妓女相等，於是形成人肉市場，紛赴各鄉販運瞎眼的青年美貌女子來省，也有慘無人道的人，故意將好好的女子雙眼弄瞎，便於弄錢。⁷

這些盲女有些是被遺棄，有些則是父母或監護人送來學藝。收養盲女的堂主一般是曾經有彈唱經歷，並有一定積蓄和名聲的「瞽姬」。⁸ 她們在年老歇業之後轉為開設堂口，

4 方靖，〈明心學校與近代廣州瞽童養教事業之實踐〉，《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期 25（2009 年 4 月），頁 39-42。

5 佚名，〈社會花絮：廣州盲妹剪影〉，《民生》（南京），期 32（1936 年 8 月），頁 15-16。

6 郭衛東，〈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女子盲人教育〉，《文化雜誌》，期 57（2005 年冬季刊），頁 77-86。

7 佚名，〈社會花絮：廣州盲妹剪影〉，《民生》（南京），期 32（1936 年 8 月），頁 15-16。

8 李淑蘋、王曉娜，〈瞽姬與清末民初廣州城市文化娛樂生活〉，《歷

專門收養 10 歲以下的盲女，傳授粵曲等演唱技藝，以經營盲妹演唱為生。堂主對盲女管教極為嚴格，盲女稍有錯誤，就要挨打或罰跪。盲女多數在 12、13 歲就開始「出身」到外賣唱，養母包辦盲女衣食住行花費，但全部收入概歸養母所有。賣唱的盲女有等級區分，層次高的有公開館舍。層次略低的除了彈唱供人娛樂外，有時肉體還會被人輕狎蹂躪。再等而下的，便走在街頭演奏樂器、沿街叫賣，待人呼喚到家中演唱，或在節日慶典、公眾聚會等場合表演。盲女如果到適婚年齡或遇到了適合的結婚對象時，可向養母提出「退身」申請，付清價款才能脫離與養母的關係。

西方傳教士對這些盲女的處境尤其同情，於是將這些見聞回報到母國，希望得到贊助者對中國盲人福利或教育事業的支持。他們在中國建立的盲校或盲人收容所，有許多都是只收女性盲人的。因此直到 20 世紀初，中國盲校女生人數仍遠多於男性盲生。根據一份教會於 1920 年所做的問卷調查，全中國 29 所盲校在學生共 745 名盲童，其中女童 498 名，男童 247 名。⁹ 另外根據 Fryer 對 1931-1941 年間全中國 38 間盲人教育與訓練機構的調查，女童有 845 名，男童 387 名。¹⁰ 西方傳教士建立的盲校，現在常被稱為中國特殊教育

史教學》，期 591（2010 年 1 月），頁 44-47。

9 Milton Theobald Stauffer, Tsinforn C. Wong, and M. Gardner Tewksbury,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in China Made by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18-1921*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pp. 365-367.

10 George B. Fryer, *Those Who Sit in Darkness: Work for the Blind in China* (New York: The American Committee of the Institution for the Chinese

的元祖。

這些盲人學校或機構，在當時一般人的看法是如何？對當時女性盲人的生活究竟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是本文感興趣的議題。有關中國近代盲人教育歷史，現有零星研究多以教會或學校等機構立場來書寫，從盲人經歷與角度出發的幾乎沒有。畢竟盲人在中國歷史上是無聲的，尤其盲女的紀錄留下來的更是稀少。背後主要原因除了性別與階級交織的雙重弱勢之外，屬於表意文字的漢文對盲人書寫更是不利。目前女性盲人資料較多為西方教會刊物如《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Missionary Journal*)、《使信月刊》(*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和盲人機構所保留下的紀錄，晚近才開始出現女性盲人的自我敘事。過去中國女性盲人書寫最大的障礙除了女性受教育機會較少之外，沒有視覺的盲人不容易掌握屬於表意文字的中文也是主要原因。¹¹

本文將以兩位分屬不同時期、不同階級的女性盲人來做比較。第一位是 1836 年生於廣東的 Agnes Gützlaff (1836-1871)，她的中文本名已不復考。Agnes 本人並沒有留下個人書寫記錄，她的生平事蹟主要是外國盲校和西方作者所記載與流傳。第二位是 1936 年生於廣州的程文輝 (Lucy Ching, 1936-2011)，移居香港後用英文打字機寫下自傳 *One of the Lucky Ones*，於 1980 年在香港出版。該書 1989 年發行的中譯本初版原名《失明給我的挑戰》，第三版之後改為《伴我同行》。兩人成長時間相隔百年，彼此遭遇有許多相似和不

Blind, Inc., 1941), p. 5.

11 邱大昕，〈臺灣早期身心障礙社會工作初探——以甘為霖的盲人工作為例〉，《當代社會工作學刊》，期 7 (2015 年 7 月)，頁 73-96。

同的地方。前者雖然主要是西方男性的觀察與描述，透過中國女性盲人來彰顯西方傳教或盲人教育的成功，缺乏女性盲人的聲音，但這些紀錄有助於瞭解當時教會對中國盲人教育的態度和看法。而後者由於傳主本身是女性盲人，有許多機會直接接觸與探詢「盲妹」的一手資料，以及瞭解當時盲人對教育的看法。透過兩人生平經驗的比較，我們可以瞭解傳統社會不同階層女性盲人的處境，以及盲人教育和時代變遷所產生的影響。

Agnes Gützlaff (1836-1869)

郭士立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¹² 是一名普魯士新教牧師與醫師，1831 年抵達中國先後到天津等城行醫佈道，並協助英商調查中國沿海市場及販售鴉片。郭士立首任太太 Mary Newell (1794-1831) 原來由倫敦宣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簡稱 LMS) 指派，於 1827 年到麻六甲設立華人女子學校，婚後隨郭士立到暹羅而於 1831 年 2 月因難產去世。¹³ 第二任太太溫施娣 (Mary Wanstall, 1799-1849) 原是「倫敦女子教育學院」(London College of Women's Education) 的教師，在「馬六甲英華書

¹² 郭氏的姓名相當多樣，中外文文獻中出現過的姓名至少有 34 個，其中較常見的為郭士立、郭實臘、郭實獵。參見王幼敏，〈郭士立的中文名及筆名考〉，《愛知縣立大學外國語學部紀要(言語・文學編)》，期 50 (2018 年 3 月)，頁 225-236。李驚哲，〈郭實獵姓名考〉，《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 (2018 年 1 月)，頁 138-148。

¹³ Clare Midgley, *Feminism and Empire: Women Activists in Imperial Britain, 1790-1865*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07.

院」(Anglo-Chinese College) 工作時認識郭士立。溫施娣的姪子巴夏禮 (Harry Smith Parkes, 1828-1885) 後來成爲英國駐華領事，也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發動者。1834 年溫施娣與郭士立結婚後，在「中國、印度、與東方女子教育促進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China, India, and the East, SPFEE；有時簡稱 Female Education Society, FES)¹⁴ 和「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的支助下，於澳門設立一所私塾。這所學校是近代外國教會在中國的第一所較具規模的學校，1839 年「馬禮遜學堂」(Morrison School) 成立之前，學生都先來這裡唸書。1835 年該校收了 12 名女童、2 名男童，中國近代首位留學美國的容闈 (1828-1912) 也是其中之一。¹⁵ 根據容闈的回憶錄，當時男女學童住在不同樓層，男生住一樓，能做戶外運動，女生住三樓，以露臺爲遊戲場。1936 年 12 月該校有 23 名學童，1837 年 3 月有 26 名學童（其中可能至少有 4 名女盲童），到了 1838 年則有 16 名男童和 5 名女童。學童在學校中英文都要學，禱告也是中英文都有。上課時間從早上六點半到八點，然後再從十點半到下午三點。課程內容除了聖經讀物外，年紀小的學童要唸四書，年紀大的唸中國詩詞，郭士立每周會考他們兩次中文。¹⁶

14 該組織成立於 1834 年，隸屬英國「海外傳道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CMS)，主要任務在挑選與訓練合適的女性到海外（特別是中國和印度）成立學校。

15 容闈著，憚鐵樵、徐鳳石譯，《容闈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頁 2-5。

16 Eastern Female Education, "China, and India beyond the Ganges," i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ary Register for 1838* (London: L. &

溫施娣曾有小孩但不幸夭折，她在澳門後前後至少收養 7 名女性盲童，使用的點字教材部分來自美國費城。¹⁷ 這些女童大都不是天生失明的，比方 Mary Gützlaff 和 Lucy Gützlaff 是小時候被綁架弄瞎當乞丐，¹⁸ Laura Gützlaff (1835-1854) 則是被後母弄瞎要當乞丐後，由生父送到郭士立家。¹⁹ Agnes Gützlaff 的失明原因則較不清楚，她曾到過伯駕 (Peter Parker, 1804-1888) 在廣州開設的眼科醫院接受治療，雖曾短暫改善視力，但最終仍失明。當時許多傳教士爲了被當地人接受而取中國姓名，而這些被收留的盲童則取歐洲姓名方便取得經濟支助出國唸書。溫施娣前後共將 7 名女盲童分批送到英國和美國唸書，期望她們學成後可以當其他盲人的老師，以及成爲在中國傳教的女傳教士。這些盲女後來不論留在國外，或者回來在中國工作，都再也沒有使用或改回中國姓名。

1837 年溫施娣爲了讓學校能夠更加擴張，鼓勵學童寫信給英國的 FES。²⁰ 1839 年夏天溫施娣將 Mary 和 Lucy 送到英國，進入剛成立的「倫敦盲人閱讀教育協會」(London

G. Seeley, 1838), pp. 277-278.

17 Alice M. Carpenter, "Light through work," *Outlook for the Blind* 31:3 (June 1937), pp. 77-86.

18 E.M.I., *The History of Mary Gutzlaff* (London: John Snow, 1842), p. 8. Chester Luke, *The History of Lucy Gutzlaff* (London: John Snow, 1844), p. 3.

19 Anonymous, *The Blind and Their Books: with Some Account of Laura Gutzlaff, a Native of China* (London: Wertheim, Macintosh & Hunt, 1859), p. 20.

20 Susanna Hoe, *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 Western Women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1-194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08.

Society for Teaching the Blind to Read) 就讀。該校第一年收了 31 名學生，其中包括來自中國這兩名女盲童，分別被登記為第 19 和第 20 號學員。年紀較長的 Lucy 個性開朗，經常笑顏逐開，因此有「快樂中國少女露西」(Merry Chinese Maiden Lucy) 的別號，Mary 則比較安靜內向。

不過溫施娣將兩名盲女送到英國之前，似乎並未先徵求 FES 同意或事先告知，此事讓 FES 頗為不悅。當時即使在歐洲，受過正式教育的盲人也是極少數，大部分盲人仍生活在貧窮中且社會地位也很低。FES 到東方辦學校是希望能夠培養當地的傳道者，將年紀這麼小的盲女童送到國外，幾年後母語都忘了，對傳教工作沒有幫助。²¹ 因此 FES 於 1839 年發信給郭士立，表示他們不會為這兩個女盲童負任何責任，並表示終止與溫施娣及其學校的所有關係。然而溫施娣可能沒有收到這封信，因為 1839 年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已經要求驅逐住在澳門的英國人。因此當信抵達澳門時，溫施娣的學校已經關閉，溫施娣和她的盲童也已離開澳門。²² 後來可能因為先天身體較弱，或者氣候不適應的緣故，Mary 於 1842 年 3 月死亡，Lucy 也於隔年 7 月過世。

1840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溫施娣和 5 位盲童前往馬尼拉短暫避難。²³ 1842 年 1 月 3 日 Laura 和 Agnes 被送到英

21 Eastern Female Education, "China, and India beyond the Ganges," i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ary Register for 1838*, pp. 277-278.

22 Anonymous, *The Blind and their Books: with Some Account of Laura Gutzlaff, a Native of China*, pp. 108-109.

23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A. Gu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8), pp. 63-64.

國，同樣進入「倫敦盲人閱讀教育協會」就讀，當時她們一個 7 歲，一個 5 歲半。²⁴ 與此同時，溫施娣帶了 3 位女盲童 Fanny、Jessie 和 Eliza 前往美國。溫施娣曾寫信給美國的教會求助，希望能讓盲童前往美國唸書，但被許多單位拒絕。Fanny 和 Jessie 最後進到費城的「賓州盲校」(Pennsylvania Institution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Blind) 就讀，這所學校成立於 1832 年，是美國最早成立的盲校之一。該校授業年限 8 年，畢業後需返回自己的故鄉，除非沒有家人朋友可以收留或者無法獨立謀生，才能繼續住在該校的收容所。²⁵ 然而這 3 位女性盲生最後全都留在美國，終身未再返回中國。²⁶ 溫施娣送三位女性盲童到美國後，於 1849 年在新加坡去世。²⁷ 隔年 1850 年郭士立回歐洲與英國女子 Dorothy Gabrie 結婚，1851 年 3 月 28 日回到香港後不久，郭士立於同年 8 月 9 日去世。而 Laura 也因水腫於 1854 年在英國去世，最後剩下的 Agnes 於 1855 年 8 月離開英國。

24 E.M.I., *The History of Mary Gutzlaff* (London: John Snow, 1842), p.8. Chester Luke, *The History of Lucy Gutzlaff* (London: John Snow, 1844), p. 3.

25 Pennsylvania Institution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Blind, *Report of a Special Committee Appointed to Consider the Subject of a Home: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Institution as a Retreat for the Adult Blind who Have Been or May be Educated There* (Philadelphia: J.C. Clarke, 1851).

26 送到美國 3 位女性盲童最後全都留在美國，大約生於 1834 的 Fanny，在 Pennsylvania Institution 工作與居住 77 年後，於 1919 年 12 月住進臨終安養院。而大約生於 1835 的 Jessie 後來在美國擔任點字印刷的校對，於 1920 年 10 月因心臟疾病在美國過世後，將積蓄捐贈給上海的獎學金。

27 Mary Wanstall Gutzlaff, <https://www.findagrave.com/memorial/60368844/mary-gutzlaff> (accessed February 9, 2023).

1856年6月 Agnes 輾轉來到寧波女塾任教。該校創立者艾迪綏 (Mary Ann Aldersey, 1797-1868) 來自英國富有家庭，也是倫敦宣教會成員，受傳教士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影響對中國產生興趣。1842年寧波成為南京條約開放港口，於是艾迪綏在倫敦宣道會資助下設立學校。後來艾迪綏又開設盲人工廠，聘僱了 11 名盲人，這些盲人每天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到工廠，從事草鞋草蓆短襪編織等手工作。Agnes 早上會到工廠教他們讀聖經，下午才回私塾教女性盲童，都是透過口傳和點字來教導聖經知識。Agnes 也會到菜市場或廟口，用穆恩點字 (Moon) 或盧卡斯點字 (Lucas) 唸聖書給眾人聽。或者陪同艾迪綏到鄉間去教育婦閱讀，她的東方面孔和西式服裝經常引來眾人圍觀。當時許多學會點字的盲人，後來多留在教會工作。像是在教會醫院傳福音、唸聖經給住院病人聽，或者到街頭表演以「手指」讀聖經，旁邊則有人販賣教會書籍。²⁸ 1860年艾迪綏結束她在中國的 23 年生涯，將盲校轉交給美國長老教會，並承諾會繼續經濟上的援助，讓 Agnes 能繼續在寧波工作。

傳統中國社會的女子難以獲得受教育權利，並且禮制規定男女有別，男女不能在同一空間學習，讓男性教導盲女更不可思議。因此盲校需要女性教師來教導女盲生，不過還是有例外。比方容閔在自傳中提到，他幼時曾在溫施娣的學校教 3 名女盲童透過點字閱讀《聖經》和《天路歷程》。²⁹ 當

28 C.F. Gordon-Cumming, "How Blind Chinese Beggar are Transformed into Scripture Readers," *The Brisbane Courier* (Brisbane), 4 January 1887, p.7.

29 容閔著，惲鐵樵、徐鳳石譯，《容閔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頁 2-5。

時容閱約 9 歲，且學校是在澳門，可能因此比較沒有忌諱。也有盲人婦女先透過男盲童學習讀寫和手風琴，然後再成為女盲童的老師。³⁰ 另外，蘇格蘭傳教士穆瑞 (William Murray, 1843-?) 在北京盲校也曾親自教一位 18 歲新婚盲女點字。盲女和她的先生都是基督徒，且在美國傳教士處受過教育。³¹ 不過彼此間必須掛著簾子，上課時盲女將手伸出窗簾，再由穆瑞指導她讀盲文。³² 當時中國文盲很多，穆瑞發明點字的目的之一，是要讓盲人來教他們識字，如此一來既能為盲人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同時也能減少中國文盲人數。³³

1862 年太平天國的軍隊占領了寧波，Agnes 被送到上海。³⁴ Agnes 在上海開始教上階層社會中國人英文，由於她通曉上海話和寧波話，因此有時也成為西方人打探中國動亂的消息來源。Agnes 於 1871 年 6 月 12 日去世，得年 35 歲。她將存款捐贈出來，希望能成立一所醫院。因此 1871 年底上海出現一所小型綜合醫院，英文名字是 Gützlaff Hospital，

30 C.F. Gordon-Cumming, *Work for the Blind in China* (London: Gilbert & Rivington, 1892), pp. 4-5.

31 C.F. Gordon-Cumming, *Wanderings in China* (London: Gilbert & Rivington, 1888), p. 427.

32 劉蕊，〈塑造與進步：中國近代盲女的教導與角色——以北京盲人學校為例 (1874-1911)〉，《山東女子學院學報》，期 2 (2020 年 3 月)，頁 45-54。

33 邱大昕，〈點與線的選擇：十九世紀末臺灣盲用文字的演變〉，《特殊教育研究學刊》，卷 45 期 1 (2020 年 3 月)，頁 105。

34 M. Miles, "Blindness in South and East Asia: Using History to Inform Development," in Brigitte Holzer, Arthur Vreede, and Gabriele Weigt, eds., *Disability in Different Cultures: Reflections on Local Concepts*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1999), pp. 88-101.

又稱 Gützlaff Eye Hospital 或 Gützlaff Native Hospital。³⁵

程文輝（1936-2011）

程文輝於 1936 年生於廣州一個中上階層的傳統家庭，爸爸是建築商，擁有 1 家建築公司。三伯曾是國民黨官員，隨國民黨撤退來台，後來到香港經商，七叔則在三伯資助下前往美國留學。³⁶ 程文輝在家中 6 個小孩中排行第三，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 1 個弟弟和 2 個妹妹。家裡有 4 個女傭，負責打掃、燒飯和照料小孩。程文輝 6 個月大時因病失明，此後便由當時年約 33 歲女傭列和負責照顧她。

當時盲女如果出身窮苦，很可能會被丟到荒地、亂墳崗、河裡，或活埋。³⁷ 倖免於死的貧家盲女則常被賣掉，或淪落為乞丐或妓女。程文輝的家境較好，得以免於遭受這樣的命運，但失明仍帶給她許多困難和不如意的經驗。程文輝小時候曾聽鄰居對她媽媽說：「你有一個失明的女兒，真是不幸。我想，大概是因為你或你的丈夫，或你們的父母或祖先，曾經做錯事，冒犯的天神，不然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女兒的」。³⁸ 爸媽其他朋友也常這麼說，而且是當著程文輝的面，一點顧忌也沒有。當時許多失明兒童父母為了避免親友嘲諷，往往把失明的子女藏在家裡，不讓他們出外或學習。因

35 M. Miles, "Blind and Sighted Pioneer Teachers in 19th Century China and India (revised edition)," <https://www.independentliving.org/docs7/miles201104.html> (accessed February 9, 2023).

36 程文輝，《伴我同行》（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06），頁 142-143。

37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14。

38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16。

此程文輝小時候也多待在家裡，除了看病外很少出門。³⁹

1940年代廣州仍然流行「盲妹」賣唱。⁴⁰程文輝在廣州曾經遇到一位「盲妹」，她在6、7歲時因麻疹失明，她的父母認為撫養一個失明的女兒，會給全家帶來厄運，於是把她送給一位專門訓練失明女孩賣唱行乞的失明婦人。⁴¹她剛開始賣唱時，必須自己緊記附近一帶街道標誌，靠觸摸去記熟沿路牆壁上的特徵、標誌、氣味、階梯數、街角形狀、或窗簷來分辨和知道自己所在位置。同時，每天最低限度要賺3毛錢，否則她不敢回去。假若她交不出3毛錢，她的師傅會懲罰她。先是打罵，然後罰她站著，要她整晚不停地練唱，沒有飯吃，次天大清早便要再出外賣唱行乞。⁴²

當時大多數的人在稱呼盲人時，不用其真實姓名，只稱他們為「盲妹」、「盲公」或「盲仔」。程文輝曾碰到一位在街頭賣唱的盲妹，她的本名是寶玉，乳名阿美，但失明後就沒有了名字，因為父母覺得這個名字不適合她。程文輝到香港時也曾遇到一位三輪車夫，他有個失明女兒從小就沒有給她取名⁴³。不僅別人叫她「盲妹」，連父母都這樣叫她。⁴⁴

「妹」和女傭不同，女傭可以自己選擇在哪裡工作，和雇主談工資，但「妹」完全沒有自由和權利，她是主人的財

39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36。

40 憐香，〈廣州的黑暗面瞽姬與艇妹〉，《都會》（上海），期27（1940年），頁16。枯鱗，〈四會神女瞽姬生活堪憐，被迫接客仍要繳熟性費〉，《針報》（廣州），期112（1947年4月），頁11。

41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72。

42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72。

43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284。

44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79。

產，可以由主人隨意買賣。⁴⁵ 程文輝出門時也常被人叫「盲妹」，⁴⁶有次還被人問說，請這「盲妹」唱一曲要多少錢。⁴⁷ 每當有人問她是不是「盲妹」時，女傭列和就會趕快解釋說她是「三姑娘」，不是「妹」。⁴⁸ 由於當時街頭賣唱的失明乞丐都會使用手杖，手杖成爲盲人乞丐和盲人娼妓的標誌，因此程文輝出門都改用雨傘來代替手杖。⁴⁹

當時一般家庭的女性很少學讀書寫字，女人只要懂得料理照顧家庭就可以。⁵⁰ 程文輝的家境比較好，兄弟姐妹都能上學唸書，唯獨她例外。她的父母不認爲她唸書後可以找到工作，或者成爲有用的人，因此從來沒有考慮過她有讀書的需要。某日程文輝從電台節目聽到英美的視障孩童，可以在特殊學校唸書。於是請哥哥協助，以無線電在業餘電台上廣播詢問，後經一位馬尼拉醫生的幫助，從美國 John Milton Society 得到一整套點字教具。程文輝就這樣開始在兄弟姊妹幫忙下，自學英文點字。⁵¹

他們好奇地看著那些厚紙和那些凸點，然後告訴我，在每組凸點的旁邊，都有一個英文字母，這些字母都是他們在學校裡學過的。我請他們把我的手指放在那些凸點上，並告訴我那些字母的名稱，幸好我常常聽他們溫習功課，所以我知道那些英文字母的次序和發音。⁵²

45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39。

46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20、47、96、101、284。

47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50。

48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20。

49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9、91。

50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24。

51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5-9。

52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9。

哥哥、姐姐唸書高聲誦讀時，程文輝便盡力去聽，然後把聽到的字寫成點字。然而這個方法只適用於英文點字，如果是國語或粵語的課程內容就沒辦法記錄下來。於是程文輝決定去找附近的盲人機構，學習國語或粵語點字。⁵³

當時廣州有兩所盲人學校，一是美籍女傳教士賴瑪西 (Mary West Niles, 1854-1933) 創立的明心瞽目書院（以下簡稱明心書院），另一是美國浸信會女傳教士威靈 (Lula Frances Louisa Whilden, 1846-1916) 創立的慕光瞽目院（以下簡稱慕光院）。賴瑪西是一名醫生，於 1882 年 10 月 19 日抵達廣州，隔年開始在博濟醫院工作，⁵⁴ 該醫院本來是眼科醫院，因此有很多眼科病人。當時有些盲女到院治療無效後不敢回家，擔心被賣掉或拋棄。賴瑪西醫生於是收留了一個 3 歲大的瞽目女童，工作之餘給予教導。後來又接收 4 名瞽目女童，借用差會傳教士的房舍教養⁵⁵。由於人數逐漸增加，乃於 1889 年成立明心瞽目書院，並自創粵語點字。招收對象為各地教會保送來的失明青少年，初期只收女童，後來才開始收男童。⁵⁶

威靈於 1872 年底達中國，此後在中國工作了 42 年。她先在家裡收容女盲童，後於 1909 年創立慕光院，每年收 1 至 2 位盲女。⁵⁷ 學校的招生原則是，只要年齡在 5 至 15 歲

53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50。

54 1835 年由美國傳教士醫生伯駕 Peter Paker 在廣州創設眼科醫局，1859 年改名為博濟醫院。

55 方靖，〈明心學校與近代廣州瞽童養教事業之實踐〉，《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期 25（2009 年 4 月），頁 39-42。

56 鮑靜靜，〈近代中國的盲人特殊教育——以廣州明心瞽目院為例〉，《廣西社會科學》，期 5（2007 年 5 月），頁 104-107。

57 Lula F. Whilden, *Life Sketches from A Heathen Land* (Greenville:

之間的一律收納，在歲數年限之外的盲生，須經特別許可才可收容。⁵⁸ 盲童在這裡學習照顧自己，包括料理自己的衣服、編織，以及學習粵語點字、鋼琴課程等。很多女性盲童進去後就一直待在那裡，長大後這些女性盲人會被分派到各地禮拜堂協助傳道工作。需要女性盲人協助的教會可以向慕光院申請，但申請條件是教會必須有女傳道駐堂，這樣慕光院才願意派盲女前去。⁵⁹

慕光院收的學生多是來自底層窮苦的棄嬰或流浪兒，上層社會的女生很少會來這裡。⁶⁰ 因此程文輝去拜訪慕光院時，在路上碰到一位婦女對她們說：「你的衣著這麼好，為甚麼想去慕光院呢？叫你的媽媽照顧你罷。」另一位賣飲料的婦女則對她說：「不要跟你的媽媽去那裡，因為很多住在那裡的失明女人，以前是由媽媽帶她們去那裡，放下了她們便走了，沒有再回來。」⁶¹ 程文輝去參觀時才 8 歲，但裡面最年輕的住宿學員都 20 歲了，而且已經額滿，無法讓程文輝去那裡學習。最後慕光院決定派一名老師到程文輝家教她粵語點字，程文輝的父母則承諾除了支付老師的薪資外，會

Woman's Missionary Union of South Carolina, 1917). David J. Brady, *Not Forgotten: Inspiring Missionary Pioneers* (Corvallis: Affinity Books, 2018).

58 郭衛東，〈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女子盲人教育〉，《文化雜誌》，期 57（2005 年），頁 77-86。

59 佚名，〈廣東慕光瞽目院戰後復員，女生三十餘人，均能編織彈琴，教導聖經，願赴鄉村教會服務〉，《浸會通訊》（上海），期 7（1947 年），頁 6。

60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52-4、177。

61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51。

定期捐款給慕光院。⁶² 這位老師和當時其他女性盲童的遭遇類似，5歲失明後便一直待在家裡沒有外出過，雙親常虐待她，甚至考慮將她殺死。7歲被父親帶到廣州遺棄在街頭，後來幸運被慕光院收容直到長大。⁶³ 當時廣州另一所明心盲人學校，距離程文輝家較遠。但為了認識童年失明女孩，程文輝會在周日和女傭列和一起去探訪。

程文輝父母不重視她的讀書，剛開始讓她去唸書只是讓她有事做，不至於閒著無聊，但他們並不相信盲人讀書能有什麼用。⁶⁴ 如同當時一位盲人在報紙上所言：

〔中國的盲人〕瞎了眼，學一個算命的，倒可以餬口過日，假使識幾個盲字，學些盲人的新技能，(如串藤、結網、音樂，打字等)，反而連飯都吃不飽，甚或任憑你熟練職業技巧，精通歐美文學，卻沒有人來請教。⁶⁵

父母對她的學習不感興趣，也不鼓勵她學點字，因為他們覺得失明人的溝通媒介是他們不能分享，也不能明白的事。而且他們擔心一旦程文輝學會點字後，就會強調自己盲人的身分，和雙親及兄弟姊妹隔離開來，彷彿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⁶⁶ 當時甚至連一般女傭也覺得失明的人懂點字沒什麼用，因為其他人不能夠讀點字，所以學會點字連寫信也

62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58。

63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59-60。

64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57-8。

65 陸慎先，〈盲人教育設施 未能適應社會〉，《申報》(上海)，1947年11月24日，第1張。

66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57、63-4。

沒辦法。⁶⁷

中國文字對盲人其實不是很友善，先天盲除了極少數常用漢字——如自己的姓名或筆劃少的漢字——外，對漢字的認識極有限，造成盲人與明眼人書寫溝通時的障礙。⁶⁸ 中文點字沿襲西方拼音系統點字，只有字音沒有字形，因此常會產生「同音異字」（如「注意」、「助益」）的問題。即使 1990 年代初期出現個人電腦作業後，使用中文的盲人在同音異義字或詞上，進行「選字」時仍有大困難，尤其是先天盲的視障者漢字根基不夠深入，打完後還是需要明眼人協助校對定稿。

不過不識字的傭人列和，反而一直支持和鼓勵程文輝學習。只要有空就把時間花在程文輝身上，拉著她的手去觸摸新東西。甚至用自己的積蓄買文具，或花錢請人唸課本給程文輝聽，讓她能把課本製作成點字書。⁶⁹ 程文輝學會中文點字之後，設法進入普通學校唸書。每個暑假她就先請人把下學年的課本唸給她聽，讓她在開學前用點字寫好課本。有時開學才發現課本改版，這時她準備的點字課本的用處便打折了。⁷⁰ 如果需要寫信，程文輝就先用點字記下來，再去唸給別人聽請別人幫忙寫出來。⁷¹

1948 年中國共產黨佔領江西，準備進軍廣東，程文輝全家逃難到香港，傭人們也都一起過去。當時香港和廣州對盲

67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108。

68 張訓誥，〈視覺障礙教育的新趨勢——盲人摸讀機的使用〉，《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年刊》，期 75（1986 年 12 月），頁 213-226。

69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17。

70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185。

71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 182。

人一樣很排斥，很多人迷信認為碰到失明者的手杖會遭到厄運。在路上看到盲人上公車、過馬路或找尋出入口時，都不願意協助盲人。程文輝和傭人列和出門時，一個是盲人，一個是文盲，沒法辨識路名，只能用嘴巴問路，但路人都只是搖頭，沒人要幫她們。不論在公共汽車、禮拜堂、餐廳、或戲院裡，都常會聽到有人說要避開她們。甚至連去領錢、坐船、租房子也都會被刁難。⁷² 她到學校圖書館找書時，圖書館員向一個同事說：

她不明白，一個盲眼女孩子跟視力健全的女孩子一起唸書，究竟有什麼益處。...倘若我〔程文輝〕不唸書，我可能不會發覺自己跟其他視力健全的年輕人有什麼分別。如今我所受的教育愈多，我便會愈多知道自己與別人不同的地方，而且會對自己的命運愈加感到悲慘。⁷³

不過香港的英文環境改變了程文輝的命運。由於她的父親不懂英文，因此開始覺得程文輝去學校學英文是有用的。除了學習英文外，程文輝也開始使用英文打字機。英文打字機讓她可以投稿讓更多人認識她，並和遠方懂英文的朋友通信或請求協助，因而給她帶來許多別人沒有的機會。⁷⁴ 有次她用英文寫信給三伯，收到回信時她非常高興。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對英文更加喜愛。英文不單使我能夠跟別人交談，並且使我可以自己用打字機寫信和寫信

72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15、49、153、298、307-8、376。

73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157。

74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164、181、245、264、290-1、294、303、317、355、393。

封。我發覺，自己雖然失明，但是，我真的能夠獨立不用倚靠別人寫信。……比起請別人先聽我把信稿讀出，然後才替我寫在紙上，容易得多了。⁷⁵

另外她也曾經把自己在課堂寫的文章，打字寄到香港《南華早報》的學生園地。結果收到一大批中學生寄來的信，其中有3個男生想和她當筆友。後來這3位男生對她唸書過程提供許多幫助。⁷⁶ 透過打字機她也可以直接和美國的盲人機構和學校聯絡，這些機緣和人脈讓程文輝於1954年從香港女學校畢業後，能夠馬上到美國「柏金斯盲校」(Perkins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進修，然後從1957年到1959年間又到德州「西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 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學習教會音樂。1959年程文輝完成學業回到香港後到社會福利部工作近四十年。除了到美國唸書這幾年時間外，列和一直陪伴著程文輝。1989年程文輝和列和一起移居美國，1995年列和因腸癌去世後，程文輝才住進老人院，後於2011年5月19日去世，享年75歲。

結語

程文輝在傳記中曾自問：究竟我與「妹」有什麼相似之處呢？⁷⁷ 這是一個長期困擾她，也是她終身想要掙脫的問題。為何女性盲人會被賣為奴？盲女如何才能躲過這樣的命運？而她們最後的歸宿又是哪裡？這些問題或許也曾經困

75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264-5。

76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292-3。

77 程文輝，《伴我同行》，頁40-1。

擾過比程文輝早一個世紀、同樣在廣東出生的 Agnes Gützlaff。從 Agnes Gützlaff 生長的 1830 年代開始，或更早以前，中國南方就已存在盲女從事乞食走唱、賣藝工作。可能因為相較於男性或女性走唱者，盲女比較容易管教聽話，也比較容易剝削。加上有些男性顧客會被女性盲人吸引，是因為覺得她們比較被動，更容易在盲女面前施展男性權力，得到想要的，這是盲女常被賣為盲妹的原因。這些盲女有的是天生失明被棄養，有的是被故意弄瞎來行乞，這種情況一直到程文輝生長的 1930 年代或更晚仍是如此。

過去多認為西方傳教士把現代西方盲人教育帶入中國，改變了中國盲人的命運。然而家境不錯或已有一技之長生活無慮的盲人，通常不會想去盲校。⁷⁸ 因為中國盲人傳統以算命走唱來謀生，而傳教士辦的盲校並不會教授這些內容。當時盲校職業訓練內容以手藝為主，但實際上盲人回到社會難以藉此謀生。19 世紀末在臺灣從事盲人教育的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曾有如下描述：

我們在福爾摩莎已經做過許多試驗，但結果都相當令人失望。像是編織、草鞋、魚網和小籃子等等，這些鄉下婦女或其他人也能做的手工藝，所能獲得的工資幾乎無法養活自己。⁷⁹

盲女的家境如果富裕，父母通常對盲校不感興趣，不想送她們來就讀。家境貧窮的盲女，比較會因為學校提供的免

78 W. T. A. Barber, David Hill: *Missionary and Saint*, 3rd ed. (London: Charles H. Kelly, 1899), p. 277.

79 William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6), p. 259.

費食物和衣服而來，但 10 多歲後又常會被父母帶回去準備結婚，因此最後只有孤兒或棄嬰比較可能留下來。⁸⁰ 這種性別差異是否也存在於中國其他地方，不同教會背景（包括新教差會、天主教修會等）或不同國籍傳教士的教育方式是否有所不同，都是將來可以繼續探索的議題。

盲人教育教授的另一項主要課程是點字。最初雖然有人提議直接找英國受過教育的盲人來中國，但要找到懂點字又懂中文的盲人並不容易。因此後來多由傳教士自行研發或學習中文點字再教給盲人，然後由盲人再去教盲人。當時點字書製作成本高、銷量少，且缺乏統一字體，因此當時除了基督教相關書籍外，很少有其他閱讀資料。學會點字的盲人，後來有的在教會醫院傳福音、唸聖經給住院病人聽，或者到街頭表演以「手指」讀聖經，旁邊則有人販賣教會書籍。⁸¹ 基督教的網絡連結，雖然可能讓盲人得到西方資源，免於淪為乞丐或娼妓的命運。然而基督教的背景，也常讓他們在中國動亂過程中成為受迫害的對象。比方在中國很多盲校出來的學生，後來在 1900 年義和團事件中成為被殺害的對象。

由於男性盲人比女性盲人較容易謀生，加上西洋傳教士對這些女性盲童特別同情，因此盲校收留許多被遺棄的女性盲童。然而 Agnes Gützlaff 和其他女盲童自幼被傳教士收養之後，後來的命運也並不一定就變得比較好。鴉片戰爭前

80 Valerie Griffiths, "Biblewomen from London to China: The Transnational Appropriation of a Female Mission Idea," *Women's History Review* 17:4 (July 2008), pp. 521-541.

81 C.F. Gordon-Cumming, "How Blind Chinese Beggar are Transformed into Scripture Readers," *The Brisbane Courier* (Brisbane), January 1887, 4, p.7.

夕，中英關係的緊張，導致溫施娣必須撤離澳門。儘管英國 FES 不贊同，溫施娣仍將收留的盲童先後送往國外。雖然溫施娣原來希望這些盲童受完教育會回到中國，但或許因為從小失明遭家人虐待而身體不佳，也可能不習慣異國氣候生活，送到英國的 4 位女性盲童有 3 位客死她鄉，⁸² 最後只有 Agnes Gützlaff 回到中國。Agnes 5 歲半被送去英國，20 歲回到中國，去世時才 35 歲。沒有家人親戚的 Agnes，回到中國後，除了教授點字和英文外，主要就是傳教工作，最後遺願便是將那 10 多年工作中省吃儉用存下來的錢，死後捐贈出來成立一所醫院。

程文輝早期較為富裕的家庭背景，讓她免於走向成爲「盲妹」的命運，她移居香港後的英語環境，也讓她在決定自己未來上具有較多自主性。當時廣州有若干盲校，但一般人多不知道。陪伴程文輝成長的女傭列和，在她整個成長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即使後來程文輝全家逃難到香港，家道中落之後，女傭列和仍繼續不離不棄、忠心耿耿地陪伴。當時的傭人不是嫁人就是繼續當傭人，幫傭不僅是工作，而是她們的人生。程文輝求學過程需要大量人力財力，當父母都不願或無法支持時，幸好有列和及教會與美國盲人基金會協助，才讓她有辦法完成在香港的學業。從某個角度來看，列和與程文輝的關係，和蘇利文 (Anne Sullivan, 1866-1936) 與海倫凱勒 (Helen Keller, 1880-1968) 的關係有些類似。都是一個階級地位較低女性的犧牲，來成全另一個階級地位相對

82 M. Miles, "Blind and Sighted Pioneer Teachers in 19th Century China and India (revised edition)," <https://www.independentliving.org/docs7/miles201104.html> (accessed February 9, 2023).

高女性的成功。蘇利文本身是個弱視者，只看得到一些光，父母都是貧窮的愛爾蘭移民，因此她 10 歲就被丟到孤兒院。如果沒有蘇利文的終身陪伴，海倫凱勒對外接觸也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Agnes Gützlaff 和程文輝最後都脫離了「盲妹」的命運，但她們採取的是當時多數中國女性盲人所無法擁有的途徑。相對於傳教士使用中文名字以拉近和中國信眾的距離，被收留的盲女卻終身使用英文名字來和中國社會保持距離，而程文輝則是靠強調自己是「三姑娘」來撇清自己與「盲妹」的關聯。在外觀上 Agnes Gützlaff 靠穿著西方服飾，來與傳統中國女性盲人形象做區隔，而程文輝以雨傘代替手杖，以避免被誤認為「盲妹」。這些方式或許出於無奈，但卻是當時女性盲人為保有一點尊嚴不得不作的選擇。障礙身體與性別、階級、國族的交織，也是未來可以透過更多東西方案例進行比對觀察與深入剖析的重要議題。

徵引書目

一、報刊

- 《民生》（南京），1936。
 《申報》（上海），1947。
 《浸會通訊》（上海），1947。
 《針報》（廣州），1947。
 《都會》（上海），1940。

The Brisbane Courier (Brisbane), 1887.

The Chinese Recorder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1889.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London), 1860.

二、專書

容閔著，憚鐵樵、徐鳳石譯，《容閔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程文輝，《伴我同行》。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06。

Anonymous. *The Blind and their Books: with Some Account of Laura Gutzlaff, a Native of China*. London: Wertheim, Macintosh & Hunt, 1859.

Barber, W. T. A. David Hill. *Missionary and Saint*, 3rd ed. London: Charles H. Kelly, 1899.

Brady, David J. *Not Forgotten: Inspiring Missionary Pioneers*. Corvallis. Corvallis: Affinity Books, 2018.

Campbell, William. *Sketches from Formosa*.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6.

E.M.I. *The History of Mary Gutzlaff*. London: John Snow, 1842.

- Fryer, George B. *Those Who Sit in Darkness*. New York: The American Committee of the Institution for the Chinese Blind, Inc., 1941.
- Gordon-Cumming, C.F. *Wanderings in China*. London: Gilbert & Rivington, 1888.
- Gordon-Cumming, C.F. *Work for the Blind in China*. London: Gilbert & Rivington, 1892.
- Gordon-Cumming, C. F. *The Inventor of the Numeral-Type for China by the Use of Which Illiterate Chinese Both Blind and Sighted Can Very Quickly Be Taught to Read and Write Fluently*. London: Downey, 1899.
- Hoe, Susanna. *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 Western Women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1-194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Luke, Chester. *The History of Lucy Gutzlaff*. London: John Snow, 1844.
- Lutz, Jessie Gregory. *Opening China: Karl F.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8.
- Midgley, Clare. *Feminism and Empire: Women Activists in Imperial Britain, 1790-1865*.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Pennsylvania Institution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Blind. *Report of a Special Committee Appointed to Consider the Subject of a Home: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Institution as a Retreat for the Adult Blind Who Have Been or May be Educated There*. Philadelphia: J.C. Clarke, 1851.

Stauffer, Milton Theobald, Tsinform C. Wong, and M. Gardner Tewksbury.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in China Made by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18-1921*.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Whilden, Lula F. *Life Sketches from A Heathen Land*. Greenville: Woman's Missionary Union of South Carolina, 1917.

三、論文

方靖，〈明心學校與近代廣州瞽童養教事業之實踐〉，《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期 25，2009 年 4 月，頁 39-42。

王幼敏，〈郭士立的中文名及筆名考〉，《愛知鼎立大學外國語學部紀要(言語·文學編)》，期 50，2018 年 3 月，頁 225-236。

李淑蘋、王曉娜，〈瞽姬與清末民初廣州城市文化娛樂生活〉，《歷史教學》，期 591，2010 年 1 月，頁 44-47。

李鷺哲，〈郭實獵姓名考〉，《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2018 年 1 月，頁 138-148。

邱大昕，〈臺灣早期身心障礙社會工作初探—以甘爲霖的盲人工作為例〉，《當代社會工作學刊》，期 7，2015 年 7 月，頁 73-96。

邱大昕，〈點與線的選擇：十九世紀末臺灣盲用文字的演變〉，《特殊教育研究學刊》卷 45 期 1，2020 年 3 月，頁 97-114。

張訓誥，〈視覺障礙教育的新趨勢——盲人摸讀機的使用〉，《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年刊》，期 75，1986 年 12 月，頁 213-226。

郭衛東，〈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女子盲人教育〉，《文化雜誌》，

期 57，2005 年冬，頁 77-86。

劉蕊，〈塑造與進步：中國近代盲女的教導與角色——以北京盲人學校為例(1874—1911)〉，《山東女子學院學報》，期 150，2020 年 3 月，頁 45-54。

鮑靜靜，〈近代中國的盲人特殊教育——以廣州明心瞽目院為例〉，《廣西社會科學》，期 5，2007 年 5 月，頁 104-107。

Carpenter, Alice M. "Light through work." *Outlook for the Blind* 31:3, June 1937, pp. 77-86.

Eastern Female Education. "China, and India beyond the Ganges." I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ary Register for 1838*. London: L. & G. Seeley, 1838, pp. 277-278.

Griffiths, Valerie. "Biblewomen from London to China: The Transnational Appropriation of a Female Mission Idea." *Women's History Review* 17:4, July 2008, pp. 521-541.

Miles, M. "Blindness in South and East Asia: Using History to Inform Development." In Brigitte Holzer, Arthur Vreede, and Gabriele Weigt, eds., *Disability in Different Cultures: Reflections on Local Concepts*.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1999, pp. 88-101.

四、網路資源

Mary Wanstall Gutzlaff, <https://www.findagrave.com/memorial/60368844/mary-gutzlaff> (accessed February 9, 2023).

M. Miles, "Blind and Sighted Pioneer Teachers in 19th Century China and India" (revised edition), <https://www.independentliving.org/docs7/miles201104.html> (accessed February 9, 2023).

I Am Not a “Blind Girl”: The Life Stories of Modern Chinese Women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Tasing Chiu*

Abstract

In the 19th century, Western missionaries established schools for the blind in China, which have often been regarded as the beginning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However, there is a dearth of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se schools on blind students, particularly from their own perspectives. To address this lacuna, the present article compares the life stories of two women, Agnes Gützlaff (1836–1869?) and Cheng Wenhui 程文輝 (1936–2011), who were born blind a century apart. By examining their life stori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blind women from diverse social backgrounds and how it has evolved over time, and consequently, desires to attract more academic attention to this important issue.

Keywords: history of the blindness, education of the blind, disability history, disability and gender, special education

* Department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